



熊月之：步步认真 环环紧迫

■文/文汇讲堂 孔冰欣

那是半个世纪前的苏北乡间，冬天农闲，说书人走村串寨，一肚子锦绣故事，引得乡村小孩兴高采烈，雀跃不已。不过说书先生赶场忙，常有“未完待续”之憾，故而，为了求得“曲终人团圆”的完满，有个小小少年一路相随说书人至十多里外的村落，偏要有始有终地把故事的结局听个明白，这份热忱的劲头，颇具几分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气概。

“男孩子哪有不喜欢看小说、听故事的？碰上有人开讲三国演义、隋唐英雄、薛刚反唐、说岳全传……那是无论如何必须得听全的，少了一回、一段，都不成！”半个世纪后，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仍对自己当年痴迷听书的活动记忆犹新。回溯其学术生涯，所精研的学术命题，初如民主思想、西学东渐，近如异质文化交汇、命理世界学理，回望其人生轨迹，从农村到城市，从军人到学者，在时代风云与历史机遇的巨浪中，恰恰可见这种紧追不舍、永不言弃的执着，正是成就其今日上海史研究领域大家身份的潜因。

务农、当兵、求学三部曲： 向命运挑战，向高处进发

非常年代，非常勤奋

祖父母早逝，身为独子的父亲一肩挑下生活重压。“兄弟姐妹六人，就靠父母劳作养活，起五更睡半夜，省吃俭用，艰辛处境难以想象。”父亲冥寿九十那年（2003年），熊月之在《梦圆》一文中，记述了童年时代的困苦，表达了对父亲的深深敬意。

地处穷乡，清贫困窘，在江苏淮阴世代务农的熊家，似乎与“学堂”、“知识”这样的词汇难成交集。然而，繁苦农活、琐屑家务并未将熊月之个人空间的光亮挤压殆尽，天资聪颖的他小学起便表现优异。1963年，勤学不辍的熊月之如愿考上省重点中学清江中学，成绩单背后的动力，却多少有几分不足为外人道的酸辛。“家里供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念书。要读书，只能靠自己的努力。对我来说，考上一般中学等于不考，因为那时，只有省重点才能由国家供应口粮，而这份口粮，是弥足珍贵的。”熊月之自初二开始当班长，1966年初中毕业，因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，学业中断返乡务农。在农村，他耕、犁、扛、挖，样样农活都拿得出手，当过大队治安主任、民兵营长，做过文艺小分队的编剧。三年后江苏省恢复高中招生，他按照规定就近报考，被淮阴县王兴中学录取，依旧学业优秀，担任班长，兼任校学生会刊物《兴中评论》的主编。

“初中时住过城市，户口迁至城市，吃过商品粮”，城乡霄壤之别的莫大刺激，更使熊月之跳出农门的渴望历久弥坚。回乡后，他听闻辽宁煤矿招工，亦曾心动，但费尽周折也未争取到名额。1972年年底，他应征入伍，成了上海警备区的一名战士。部队生涯于熊月之而言是全新的体验，这里纪律严格，训练严格，集体观念强。因为文化素养较好，他帮助不识字的战友识字写信，帮助连队出黑板报、写通讯稿，还常被抽调去帮助上级机关写总结报告。

1974年，所谓“批林批孔”运动兴起，其中一项工作是组织理论队伍注释法家著作，评法批儒。上海共成立六个注释组，包括韩非子组、王安石组、《梦溪笔谈》组、章太炎组等，每个组均由知识分子、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战士四部分人组成。熊月之作为军人代表，被分至章太炎组。“青少年时代兴趣点多在数理化上，很少考第二名”的他，起初不知章太炎为何方高人，遑论章氏著作素以古奥闻名。入组三年，熊月之与陈旭麓、汤志钧、朱维铮、姜义华等大学者朝夕相对，其间收获，远非“幸运”二字可涵括。

章太炎注释组是学业转折点

当时，章太炎组挂靠在复旦大学历史系，从校图



①1983年与陈旭麓先生(右一)在一起
②与唐振常先生在一起
③和姜义华在复旦校园
④熊月之在上海警备区当兵
⑤章太炎著作注释组部分成员合影

大学梦圆，成功有迹可循

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粉碎，沉重一页翻过，包括章太炎注释组在内的所有注释组全部解散。1977年3月，熊月之复员回到苏北老家，在淮阴县人民武装部做通讯员。这年冬天，已近而立之年的他报考了江苏师范学院（今苏州大学）历史系，以优异成绩被录取，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。

成功有秘诀吗？熊月之总结，“做事认真，极其努力，环环相扣，这在一定意义上，可以说是我成功的秘诀。”的确，他极其认真地念书，极其认真地当兵，极尽认真地做事。命运不会眷顾倦怠之人，一步一步走来，熊月之的成功，扎实而稳。

研究民主思想、西学东渐： 一心求真、求善、求美

选择近代思想史，缘于三个背景

1978年秋，熊月之在就读苏州半年后，考取华东师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，与陈旭麓先生再续师生缘。三年耳濡目染，陈先生是近代史大家，所提出的“新陈代谢说”，对中体西用、革命与改良等议题的讨论，影响很大。陈先生善于治学和育人。在陈旭麓指导下，熊月之陆续发表《论黄宗羲、唐甄的民主思想》、《论郭嵩焘》等论文，激发了学术自信。

陈先生对研究生的治学范围，并无严格规定，而熊月之因为参加过章太炎注释组，以前接触的资料多与思想史有关，在复旦接触的学者又大多涉足思想史，故选择以近代思想史入手，作为自己史学研究的最初领域。“做出这个决定，主要缘于三个背景。首先是社会大背景。文革结束，思想解放，人们开始反省专制威权下民主的缺位。其次是个人小背景，长期生活在落后农村的底层，对于农民没有民主权利、缺乏民主监督的乡村生活，有感性知识。第三是学术背

景。以前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。”

1983年，熊月之第一本专著《章太炎》问世。此前他曾于研究生笔试时放出豪言，“准备写100万字的章太炎评传”，结果面试时遭到陈旭麓先生的善意提醒：“100万字恐怕困难，不如先写10万字，可以编到我主持的‘中国近代史丛书’系列里。”至1986年，《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》付梓，陈先生亲自作序，称赞该书“取材甚丰、论旨鲜明，有明快的时代节奏感”。1994年，《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》出版，被誉为“必读佳作”。论著不断，开阔严谨，熊月之在国内外学术界声名鹊起。

对“民主”、对“西学”皆应客观视之

在熊月之眼中，“民主”时至今日仍然极具话题性。从价值理性判断，民有、民治、民享，反对独裁，体现多数人利益……民主的内涵是如此美好，然而，一旦落实到具体国家、地区，则必须与当地历史文化、民情风俗相匹配。他指出，晚清时期，“民主”旗帜高扬，章公炳麟就在《代议然否论》中，直言民主制度的落实，一定要与本国实际情况相匹配。“若以二十万人选一，彼万人所知之贤良，非十九万人所知，而万人所知之土豪，则为十九万人所周知，是贤良终不能与土豪抗也。”可见举国选举，令有名有利者趁机，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膏粱。名曰国会，实为奸府，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，使得腰腊齐民，甚无谓也”。

对舶来的“民主”照单全收并非良策，同理，对“西学”的态度也应客观视之。熊月之认为，国人在接受西学方面可分真、善、美三个方面。其物质文化是“真”——如坚船利炮及其它所谓“奇技淫巧”，易见效，更实在；制度文化是“善”——如议会制度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移植与观察，自然会得出“好不好”的结论；精神文化是“美”——审美的主观性很强，受文化传统影响更大，因此争论最多。“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影响是整体性的，如今全球化时代来临，新一轮的西学东渐在所难免，但我们无须过分忧虑，继续求真、求善、求美即可。”

让上海学成为“显学”：

“希望无愧时代、尽最大努力”的宏愿

牵头《上海通史》，格局开明变通

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，熊月之在前辈大家的引导下自觉探索更开放的天地。1981年，他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，长期跟随唐振常先生研究上海史，在唐先生的栽培下熟谙城市掌故，阐幽发微，探骊得珠。唐先生有“侠儒”风范，徜徉肆恣不拘一格，对熊月之的关爱提携溢于言表，外出开会总喜与弟子抵足夜谈，指点江山。而熊月之也不负师恩，为先生文集的出版事宜辗转奔波，其所作《史海寻渡一通才》悼文，将已故唐君的气品风貌描摹得形神兼备，读之实在可亲可敬。

众所周知，开埠以来上海一直是传递西学、输入新文明的“出张所”，研究上海，应当将其置于全球化视野中看待。唐先生自1980年代起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《上海史》的编写工作，在实施过程中，他大胆使用年轻人，在学术上秉持独立自由的原则，力主客观评价租界作用，支持租界双重影响论，为上海史研究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。“租界问题是绕不开的‘拦路虎’，如果不能很好地开展对于租界的研究，那很多问题都说不清楚。”受到唐先生的启发，熊月之运用马克思关于英国在东印度统治双重影响的著名论断，在1983—1988年发表了《论租界与晚清革命》、《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》等系列论文，既打破对租界片面、公式化的判断，开启了对租界进行具体分析的进程；也将租界研究推进到社会范畴。（下转第3版）